

纳粹德国外交决策体制与驻华军事顾问团

孙红国¹, 陈世阳²

(1. 九江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西 九江 332005;

2. 韩山师范学院 政法学院, 广东 潮州 521041)

[作者简介] 孙红国(1978-), 男, 湖北武汉人, 九江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历史学硕士, 主要从事现代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研究; 陈世阳(1977-), 男, 湖北十堰人, 韩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史研究。

[摘要] 纳粹上台初期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 外交决策机制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外交部、国防军与纳粹党成为德国远东政策决策的争夺者。随着纳粹党的最终胜出, 亲华政策终止, 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被迫撤出。

[关键词] 纳粹; 外交决策; 军事顾问团

[中图分类号] K51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6-0787-06

在中德关系史上, 驻华德国军事顾问团历来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学界普遍认为: 军事顾问团的存在, 在促进纳粹德国在华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的同时, 也在德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但就研究的侧重点而言, 对德国外交决策层在顾问团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 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稍显薄弱。因此, 本文即尝试从德国外交决策体制演变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研究。

一、纳粹上台后德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国的活动, 最早应追溯到晚清时期, 当时李鸿章曾聘请德国人帮助训练军队,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赢得了许多军方将领的赞赏。一战后, 一些德国退役军人陆续来到中国, 充当一些军阀的顾问, 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蒋介石所聘请的鲍尔顾问团成员的林德曼。但是, 德国军事顾问真正成为中德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并在德国国内引起很大争议则是在1928年蒋介石执掌中国政坛之后。当年年初, 曾经担任苏俄顾问的鲍尔率领一批德国退役军人来华充当蒋介石的顾问。对此, 德国外交部和国防军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外交部担心此举会引起蒋介石的反对派和日本的不满, 从而损害自己长期以来在远东地区追求的平衡外交。而国防军则在经济界的推动下, 对顾问团的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种分歧在纳粹上台后不但没有得到消弭, 反而使分歧得到进一步扩大。

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 立即把自己夺取生存空间、称霸世界的对外战略付诸实施, 重新确定了自己的外交政策目标, 其中对远东政策最具影响的有两点:

(一) 确保海外战略原料的供应

德国的扩军备战, 需要大量的原料供应, 但德国本身战略资源却十分贫乏, 主要战略原料除煤炭储量足够外, 其他如石油、橡胶等均依赖进口。据统计, 战前德国85%的石油、80%的铁矿石、70%的铜、90%的锡、95%的镍、98—99%的钨和铋及20%的食物原料均来自海外^[1] (第180页), 从某种意义上说,

德国无法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家。因此,德国外交的一个紧迫任务就是拉拢世界主要原料生产国以获得稳定的原料供应。

(二)积极寻找盟友,解决德国未来可能面对的两线作战问题

鉴于一战期间德军两线作战、疲于奔命的教训,纳粹党上台后积极寻找盟友以图改变德国地缘政治的劣势。德国将一战后因分赃不多而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心怀不满的意大利和日本视为候选盟国,积极发展同它们的关系以图在未来战争中对主要敌人英、法、苏形成牵制。

德国整体外交的调整使中日两国在德国远东外交中的战略地位均得到提升。日本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和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拥有较高的国际地位,在德国关心的赔款和裁军等问题上有相当发言权。而且,日本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东亚与英、美、苏等国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因而它在未来的战争中可以充当制衡和牵制德国的对手的角色。因此,纳粹上台后不久就将与日本结盟列为重要战略目标。另一方面,中国富饶的资源及对德国商品的巨大需求使其在纳粹德国的战略棋局中也拥有地位。从市场情况看,中国已成为德国军火的一个大买主,并日益成为德国重工业理想的投资场所。据统计,到了魏玛后期,德国军火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比例有了明显上升,从1928—1932年基本上保持了20%的较高比例,最高年份更是高达31.5%^[2](第77页)。在原料供应方面,中国的地位更显重要。1929年德国工业所采购的88%的铋和53%的钨均来自中国^[3](第106页)。这些都是德国重整军备必不可少的原料,在德国对外采购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德国远东政策的最佳定位是维持传统的中立政策,与中日两国建立同等友好的关系。但是,令德国人苦恼的是: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之间的对抗愈演愈烈,随时都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由于两国都在寻求德国的明确支持,德国在远东的骑墙政策注定不能持久,在中日间作出取舍的是德国最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然而,德国统治集团内部对此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外交部、经济部和国防军等主张从德国扩军备战的实际需要出发,主要在远东采取亲华政策以确保战略原料的供应,纳粹党则从世界战略考虑,希望同日本结盟。德国内部远东政策上的不一致,无疑会影响到在华顾问团的活动。

二、外交部与国防军在顾问问题上的分歧

应该说,纳粹党上台之后,外交部和国防军在顾问问题上已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两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取得一致,如都重视军事顾问对德国在华利益的巨大促进作用,主张军事顾问继续留在中国,以维持和扩大德国对中国的影响。然而,两者的分歧并未完全消除,他们在军事顾问的活动范围上仍有较大分歧。具体来说就是,外交部希望顾问团立足于本职工作,不要插手军事事务以外的领域,尤其是不能插手容易引起争议的经济事务。同时,顾问团的派遣应与国民党中央保持一致,不得参与地方实权派军队的重整军备活动。国防军则出于重整军备的需要,积极鼓励顾问团介入经济事务,尤其是中国的对外军火采购,以争取更多中国订单,而为了换取更多战略原料,国防军也愿意同中国地方实力派打交道。外交部和国防军的分歧,集中体现在克兰计划身上。

赛克特1934年来华时,国防军和工商界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垄断中国对外军火采购,扩大中国原料对德国的输出。赛克特认为:“原料供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我们需要大约20亿马克的原料……我们的问题可能在中国得到解决”^[4](第179页)。因此,作为军事顾问来华的赛克特,其兴趣点很快转移到了经济事务上。他为中国政府所写的备忘录,主要是讨论建设中国军火工业及出口中国矿砂以换取德国工业设备等问题。他也提出:“军事装备的采办应集中于一人”^[4](第178页),并愿意推荐一名合适的德国人,此人就是退役军官克兰。克兰在1934年设立了一个名为“工业产品贸易公司”(简称合步楼)的公司,名义上它是由克兰主持,但真正的主持人是国防军。这样,国防军获得了对中德军火贸易的某种控制权。但是,国防军此举势必会影响到以中小公司和中间商人为主的在华德国传统商界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代表这部分人利益的汉堡。布劳梅尔协会的代表不断就此向国防军提出质

询^[3](第257页)。对国防军一手包办对华事务的作风不满的外交部也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驻华公使林德曼认为,在华德国公司是德国在华商业活动的基础,赛克特的建议及国防军的做法将“严重损害德国的对华贸易,而开展对华贸易实际上是我们唯一的自强之途。”他也对赛克特介入贸易的做法表示质疑^[5](第78页)。

国防军并未因外交部的反对而做出妥协的姿态,反而继续尝试强化对中德贸易的控制。1934年8月,在赛克特的支持下,克兰同南京政府签订了一项易货协定,规定以中国原料换取德国军火和工业设备。国防军此举是德国疯狂扩军备战的客观需要和必然结果。纳粹上台后开始大规模重整军备,致使战略原料进口激增,对外贸易逆差严重,外汇资源枯竭。传统的贸易方式已无法保证稳定的原料供应。于是,纳粹政府开始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来克服因支付手段有限给扩军备战造成的困难。易货贸易的实施使德国政府加强了对外贸的控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外汇于战略原料的进口,同时也能通过易货贸易谈判,打开贸易对象国的市场。克兰同南京政府签订的协定只是德国这一新贸易政策在中国的尝试。这种做法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在于:国防军并不满足于只同南京中央政府打交道,在同南京签订初步易货协议的同时,也在同广东军阀陈济棠协商类似的易货协议,克兰为此积极奔走,赛克特也对此表示支持。这就使德国卷入了中国国内政治的漩涡。南京政府对克兰在广东的活动深为不满,并一再向外交部施压,要求阻止克兰在广东的活动。外交部对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的微妙关系比国防军清楚得多,因此一再表示希望国防军停止克兰的广东计划,集中精力与南京政府的易货贸易谈判。

克兰计划将纳粹党也牵扯进来,由于对中国国内政治所知甚少,从重整军备的需要考虑,纳粹党最初对克兰计划是表示支持的,因此当克兰于1935年返回德国面见希特勒时,希特勒为表示对他的绝对信任,让他向蒋介石转交自己的亲笔信和礼物,但是,当蒋介石对克兰的不信任表露无遗,且因为这一事件与赛克特的关系持续恶化,已经严重威胁到在华军事顾问团的地位时,纳粹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希特勒很快否决了这一计划。

尽管克兰广东计划宣告失败,但国防军并未停止类似活动。1936年,国防军又允许林德曼到河北宋哲元那里担任顾问。鉴于河北作为中国抗日第一线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中日两国在河北不断紧张的对峙,林德曼强调“德国决不应卷入中日纠纷”^[3](第177页)。由于纳粹党此时正在同日本谈判建立同盟关系,国防军被迫妥协,召回了林德曼。从国防军在这两次纠纷中的表现来看,其对外政策中存在一种轻率冒进的心态。为了获得原料和市场,它们敢冒任何风险。布罗姆贝格在谈到向广东派遣军事顾问团一时指出:“南京方面几乎没有反对退休军官在顾问团效力,而南京本身要求并获问候语派遣考察团到德国。为了搞好关系,我们应保留对广东派出军事顾问的权利,即使南京反对这样做。”^[4](第131页)这种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不计后果的行事作风使其所主张的对华政策陷入困境。它不仅导致了与外交部关系的恶化,而且让长期觊觎外交决策权的纳粹党有了可乘之机,纳粹党后来居上,逐渐控制了德国整体外交的决策权。

三、德国外交决策体制分析

纳粹党的上台使德国原有的外交决策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外交部与国防军共同控制外交决策的局面被打破。纳粹党作为一股新兴力量登上了外交舞台,成为角逐外交决策的第三方力量。而随着纳粹党统治地位日趋稳固,外交部与国防军的决策权不断遭到剥夺,纳粹党逐渐控制了德国整体外交的决策权。

下面从外交部、国防部、纳粹党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纳粹党上台后,外交部在纳粹政府机构中的地位大大下降。作为一个由文职的公务员组成的机构,外交部的权利主要来自于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对其制定政策的认可。换言之,外交部是靠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对它的信任来行使权利的。然而,出身卑微的希特勒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外交部人员极

端反感和厌恶。对他们的能力表示怀疑和不信任。但他上台后并未更换外交部长或次长,而且在这一部门的高层官员中,无一是纳粹分子。这是因为,外交工作是一项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连续性,且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外交人员必须具有较强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尤其是作为外交部长,还需要优秀的人格素质和良好的国际声望。纳粹上台之初羽翼未丰,既要在国际上表现得无意改变魏玛德国的传统外交政策,继续与英法等民主国家敷衍,又需各类人才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无奈只好留用魏玛政府的职业外交官。但到了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德国重整军备的顺利推进,德国的经济军事实力急剧壮大,已经初步具备了向往扩张的条件,而德国军队进入军事不设防区、干涉西班牙内战等外交冒险的成功,暴露了英法绥靖政策软弱的本质,德国的扩张野心急剧膨胀,希特勒已不再需要外交部的稳健政策这个幌子了。

外交部地位的下降,直接体现为许多重大决策是绕过外交部做出的,外交部只是事后才得知。这在远东政策上尤为明显,1936年同日本谈判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不是外交部,而是希特勒信任的里宾特洛甫。林德曼曾抱怨:“国防部就与克兰计划相关的军事事务同中国进行商谈时,把驻华领事馆撇在一边。”^[4](第140页)甚至一些很普通的访问接待事宜,外交部也被排除在外。1935年初,一个由中国交通部副部长领衔的代表团来到德国购置军火,但访问的行程和组织基本上是纳粹党的外国政治处一手包办,赛克特的代理人就此事同纳粹党进行了沟通,却没有给外交部打招呼^[4](第113页)。正如魏茨泽克在纽伦堡审判时所说的那样,外交部已经降为“一个技术性的机构”^[4](第2页)。

与外交部决策地位直线下降比起来,国防军在纳粹政府中地位的演变呈倒V字型。在纳粹上台初期,国防军作为一个强力部门和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是希特勒巩固统治不得不拉拢的对象,并且国防军和纳粹党在扩军备战、实行独裁统治等问题上持有类似的想法。因此,在纳粹上台初期,对国防军是宠爱有加,极尽拉拢之能事,国防军在德国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它在内政外交上的发言权也得以加强,尤其是对外经济政策方面,国防军通过与经济部长沙赫特的合作,实际上控制了这一领域的决策权。30年代中期德国在远东和东欧的易货贸易政策,正是国防军和经济部的杰作。

但国防军与纳粹党在许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在外交政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国防军比较赞成外交部所持的稳健作风,主张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德国的复兴,反对纳粹党的冒险政策,因而在进军莱因不设防区和与日本缔结军事同盟等一系列问题上与纳粹党意见相左。同时,国防军上层如陆军上将弗里奇,主张继续维护陆军的独立与完整,对纳粹势力渗入国防军深感不安^[6](第239页)。而纳粹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无法像魏玛共和国那样容忍国防军成为国中之国。兴登堡死后,纳粹党对国防军的控制逐渐加强。时任国防部长的布罗姆贝格也想通过向纳粹靠拢的方式来确立和巩固国防军的相对独立地位,这使得纳粹党在国防军中的影响迅速扩展,年轻一代的国防军军官对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尤为认同,这就削弱了国防军独立地位的基石——普鲁士军官团的团结。同时,希特勒退出国际裁军谈判,进入莱因不设防区等外交冒险的成功,也提高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声望,国防军的独立地位日趋没落。

此外,纳粹党卫队的建立可被视为国防军地位下降的一个标志。1934年罗姆暴动失败后,希姆莱的党卫队成为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它既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也不为政府所控制,在纳粹政权体系中享有特殊地位,党卫队在希姆莱的经营下不断扩充,从1933年的5万人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万人,俨然成了国防军外的国防军^[9](第250页)。党卫队的出现,大大减轻了纳粹党在军事上对国防军的依赖,国防军在德国国内政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

国防军政治地位的下降,无疑会影响到其对外交决策权的争夺。1936年12月,日本主动与国防军联系,希望就《反共产国际协定》中的军事协议进行谈判。布罗姆贝格对这一提议的回答是:“这一协议属于政治范畴,应由德国政治领袖来处理”^[4](第210页)。在与自己利益攸关的军事战略问题上国防军都持这种回避的态度,它对德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纳粹党上台之初,对外交并未作较多干涉,国防军和外交部共同控制了外交决策,但这只是过渡期

的需要。随着纳粹统治地位的日益稳固,希特勒越来越渴望直接控制决策权,以便顺利推行自己征服欧洲、称霸世界所需的对外战略。为此,纳粹党在其内部设立了外国政治处、外事处和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处理纳粹党认为至关重要的外交事务,30年代德国重大战略举措如:1936年与日本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和1939年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等,均是纳粹党的杰作。

应该说,纳粹党对外交决策影响力的增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纳粹党赌徒式外交的胜利,1933年10月,希特勒先后宣布退出国际联盟。1935年3月16日,德国撕毁《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1936年3月7日德国国防军进入了莱因非军事区,这些措施均未遭到协约国的制裁,从而大大提高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外交事务上的声望和地位,也更激起了希特勒直接掌握外交政策的欲望,他开始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外交事务。纳粹党与国防军及外交部间的分歧也日益公开化。

四、中日战争的爆发与顾问团的撤回

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中日矛盾终于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德国长期不愿面对的在中日间做出抉择的难题摆在了它的面前,原来虽模糊却左右逢源的远东政策已走进了死胡同。但是,对于是选择日本还是选择中国的问题,德国国内各派的观点并不一致,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顾问问题则由于其中日战争中的敏感性,自然成为争论的重要议题。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最初使纳粹党颇为不满,这并不是因为纳粹党特别同情中国或主持正义,而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共产主义的危险,日本的行动不仅会促使中国更加依赖俄国,并且会大大降低日本在远东牵制英、法、苏的战略价值。狄克逊在“七·七”事变后写道:“这次冒险使我们想要的(日本)向苏联施加压力的作用变为零。”^[7](第123页)纳粹党魁罗森贝格甚至认为:“德国的亲日政策是一个错误。”^[4](第140页)但是,纳粹党并未因为这种不满而放弃日本倒向中国。戈培尔的宣传部在战争初期极力渲染日本的胜利,对中国的失败则加以夸张的报道。驻德大使陈天放就此向德国外交部抱怨:“在德国媒体对中日战争的报道中,中国的失败和不幸往往被放大”^[8](第109页)。里宾特洛甫则不断向希特勒报告“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已经到了危险境地。”^[4](第268页)纳粹党的这种亲日倾向在顾问问题上,就是亲纳粹的狄克逊多次提出召回军事顾问的建议^[9](第14页)。他担心顾问团继续呆在中国会使日本误以为德国支持中国。

但是,纳粹党和亲日政策遭到了国防军和外交部的抵制。他们认为,德国在华利益才是远东政策的重点,日本的行动构成对德国在华利益的威胁,并使德国的战略价值下降,德国不能为争取日本而放弃中国。林德曼在给外交部的信中指出:“如果德国放弃中国,在华利益的损失将达到4亿马克之多。”^[8](第26页)外交部秘书麦肯逊也表示,日本在“中国北方采取的行动意味着减轻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而加重与我们友好的中国的负担。他表明日本人是多么不愿意顾及我们的利益,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们不能放弃与中国的良好关系。”^[9](第14页)因此,对狄克逊的建议,外交部部长办公室主任魏茨泽克表示,“召回我们的军事顾问将意味着在目前时刻站在反对南京的一边,因此不予考虑。”国防军则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立场。根据美国驻德国大使吉尔伯托的情报,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又有三名德国军官前往中国服务,还有一名准备11月份动身前往中国^[4](第258页)。

在这场争论中,希特勒再次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尽管他有强烈的亲日倾向,但他并没有急于做出决定,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破产,战争呈焦灼状态,局势并不明朗,同时希特勒还幻想通过外交调停能够化解这场危机。因此,希特勒在11月4日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召回顾问一事还须拖延。”^[4](第262页)希特勒的这个表态使亲日派的立场有所软化,两天之后,狄克逊表示,此时撤回顾问没有必要。他已同日本参谋本部达成共识,要让顾问在调停中日冲突中发挥作用,特别是向蒋介石警告“长期战争所可能带来的后果”^[3](第307页)。

从中日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德国国内在军事顾问团问题上的争论也再

度升温。狄克逊在 1938 年 1 月 26 日的报告中建议, 由于日本即将取得胜利, 德国应召回顾问团, 承认伪满洲国。此举得到了戈林、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等纳粹分子的支持, 外交部与国防部均表示反对。林德曼表示, 撤回顾问的“影响是灾难性”的, 苏联顾问会取而代之, 中国陆军会成为一支苏联式的军队^[4] (第 301 页)。而国防部长布罗姆贝格则试图趁里宾特洛甫还在伦敦的时候, 结束关于召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的讨论^[9] (第 15 页), 德国亲日派与亲华派的争论自此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希特勒的态度成为决定胜负的重要砝码。而希特勒一方面对外交部长期存在着厌恶与藐视, 对国防军的桀骜不驯深为不满, 另一方面, 他也急于在中东欧实施侵略扩张的计划, 需要日本这个盟友, 因而他最终站在了亲日派的一边。1937 年底国防部长与外交部长均被撤换, 次年初希特勒下令撤回顾问, 并威胁如果顾问不服从, 他们在德国的亲属将会有麻烦^[4] (第 327 页)。同年 6 月, 除了少数顾问外, 绝大部分顾问返回了德国。这样, 亲日派与亲华派在顾问问题上的斗争以亲华派的失败告终。

[参 考 文 献]

- [1] 樊亢, 宋则行. 外国经济史: 第 3 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 [2] 马振犊. 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评述[G]. 南京: 民国档案, 1996.
- [3] Kirby, William C.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M].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4] Fox, John P.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a study in diplomacy and ideology[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 [5] 吴景平. 抗日战争前塞克特访华的史料选译: 上[J]. 历史档案, 1993, (1).
- [6]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 德意志史: 世界大战时期: 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7] Martin, Bernd. The German Advisory Group in China 1927—1938[M]. Dusseldorf: Droste Verlag, 1981.
- [8] Liang His-Huey.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1941[M]. Assen: Van Gorcum, 1978.
- [9] 李乐曾. 试析 1933—1938 年纳粹德国在远东政策上的分歧[J]. 历史教学问题, 1998, (4).

(责任编辑 桂 莉)

Nazi German Foreign Policy-Making & German Advisory Group in China

SUN Hongguo¹, CHEN Shiyang²

(1. Faculty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Management,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332005, Jiangxi, China;

2.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Guangdong, China)

Biographies: SUN Hongguo (1978-), male, Lecturer, Faculty of Political and Public Management, Jiujia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and &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CHEN Shiyang (1977-), male,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Lecturer, majoring i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bstract: The Nazi Party made a significant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soon after it came into power. Meanwhile, the institution of decision-making on foreign policy also underwent tremendous changes.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he Army and the Nazi party scrambled for the power of decision-making on German Far Eastern policies. When the Nazi party succeeded in the contest, the pro-Chinese policies were given up, and the German advisory group in China had to leave.

Key words: Nazi; Decision-making on Foreign Policy; Military Advisory Group